

带有“文溯阁宝”印的《四库全书》。(沈阳故宫博物院供图)

数珍

辽宁古籍新闻

策划 于林殊 责任编辑 周仲全 视觉设计 隋文锋 检校 冯 赤 赵 琢

《四库全书》是我国最大一部手抄丛书

乾隆为此在盛京修建文溯阁

本报记者 吴限

壹 乾隆是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的第一个读者

每次走进沈阳故宫，记者都要驻足文溯阁，乾隆皇帝题写的“文溯阁”匾额历经200多年风雨，仍是故宫里最独特的风景。沈阳故宫博物院副馆长李理每天都会从“文溯阁”的匾额下经过，在他的心目中，这座建筑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，因为这里曾经皮藏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——《四库全书》。故事还要从乾隆四十八年(1783年)讲起。这年秋天，已沉寂了许久的盛京宫殿(今沈阳故宫)突然热闹起来——九月十七，乾隆皇帝第四次东巡驻蹕于此，他要到新建成的文溯阁里查阅刚刚运到的《四库全书》。此时，样书已经摆在了阁内一楼大厅中央嵌有螺钿片的雕花大书案上，这意味着乾隆皇帝是盛京宫殿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的第一个读者。这一年，他73岁。李理介绍，乾隆对自己修撰《四库全书》的壮举非常自豪。当他看到新建的文溯阁和阁中陈列的《四库全书》后，不胜感慨，当即挥毫作七言古诗《题文溯阁》，还撰写了一篇富丽典雅的《文溯阁记》。那么，乾隆皇帝为什么如此重视文溯阁呢？这是因为建在盛京宫殿内的文溯阁是清代专为贮存《四库全书》而建的“七大藏书阁”之一，且属于皇家“北四阁”，地位非常重要。乾隆四十六年(1781年)十二月，乾隆皇帝组织人马抄写完毕的第一部《四库全书》藏进紫禁城文溯阁(北京)；第二部书于第二年秋天完成，分五批陆续运往盛京皇官文溯阁(沈阳)；第三部书于乾隆四十八年藏于文源阁(圆明园)；第四部书于乾隆四十九年(1784年)贮进天津阁(承德)。乾隆当初的想法是只抄写四部，仅藏于北京、承德和盛京。后来，他想到江浙为人文渊薮之地，于是“复命续缮三部”，分藏于江苏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，江苏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，浙江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，以便士人就近抄录传观。至此，共七部《四库全书》分藏“北四阁”“南三阁”之中。“要知道，《四库全书》是手抄书。它是刻本书时代的写本书，弥足珍贵。其中‘北四阁’之书为皇室禁物，与士子无涉；江浙‘三阁’之书准许普通士子入阁抄录观摩，这对江南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。”李理说。

小讲堂

XIAO JIANGTANG

为什么起名“四库全书”？

《四库全书》分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。这种富有诗意的分类法称为“四库”，成为中华典籍的代称。其实，此种分类法早在晋代就已成形。晋初藏书家荀勖整理政府藏书，改变了西汉刘歆的《七略》之法，分目次为四部：“一曰甲部，纪六艺小学；二曰乙部，纪诸子、兵书、术数；三曰丙部，纪历史旧事、皇览杂著；四曰丁部，纪诗赋、图赞、汲冢书。”后东晋李充加以调整，以五经为甲部，历史记载为乙部，诸子为丙部，诗赋为丁部。隋唐以后遂沿用此种分法，称为“经、史、子、集”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曾记载：“两部各聚书四部，以甲、乙、丙、丁为次，列经、史、子、集四库。”从此，书分“四库”成为定制。《四库全书》中的“经”为群经及小学之书，如《易经》《尚书正义》《毛诗指说》《尔雅注疏》等；“史”为纪事之书，如《史记》《竹书纪年》《建康实录》《岁时广记》等；“子”为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者，如《孔子家语》《世说新语》《西京杂记》《归田录》等；“集”为诗文新曲、散篇零什，如《楚辞章句》《李太白集》《文心雕龙》《沧浪诗话》等。全书著录书籍3500余种，7.9万余卷，订成3.6万余册，221万多页，9亿多字，分装在6600余只楠木盒中。《四库全书》每一册封面都是绢面，颜色各不相同，分别用象征四季的颜色来表明书的类别，“经部”用黄绢和绿绢，“史部”用红绢，“子部”用蓝绢，“集部”用灰绢。每册书页的形式都是固定的格式，为红色边栏、界格、四周文武线，每页8行，每行21字，书口鱼尾上写“钦定四库全书”，下写书名及页码，每书前页是该书提要，然后是该书内容。每册书首页左上角盖“文溯阁宝”朱印，尾页盖“乾隆御览之宝”朱印，每匣上面均刻有书名。

贰 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

“就确切价值而言，《四库全书》几乎囊括了乾隆时期以前，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。今天来看，《四库全书》的阅读功能已完全被文物价值取代，经、史、子、集中的任何一种，任何一册，甚至任何一页都是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。”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主任刘冰告诉记者，《四库全书》全称《钦定四库全书》。整部书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系统全面的总结，让中国的文、史、哲、理、工、农、医等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源头和血脉，可称作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、最完备的集成之作，呈现出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。乾隆是这个创举的决策者和总策划人。”刘冰说，乾隆三十七年(1772年)安徽学政朱筠上奏，请求乾隆对《永乐大典》重新进行整理，收集更多的资料文献加以补充。乾隆认可，下旨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书籍。征集工作历时7年。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工作由乾隆皇帝的三位皇子领衔，20多名机要大臣共同负责，名臣刘统勋、于敏中、纪晓岚、陆锡熊、孙士毅等人皆名列其中，有4400多人参与。而后，朝廷又征调了全国各地保举、经考试录用的3800多名落第举子，用工整小楷缮写了七部。从编纂开始到最后全部抄写完毕，共历时15年。如此浩大的编修工程在当时相当不易，乾隆进行了详细的分工。他要求负责编纂的文官要对征集来的所有书籍进行筛选，一旦确定入选版本，文官们要对其进行加工润色。先由低级文官进行改错别字、改语病、改用词不当的错误，所有改动要写在纸条上，夹在书里相对应的地方，然后呈中级文官审查。中级文官若同意某些修改内容，就用朱砂笔在书中修改，若不满意就不作改动。之后再把手书呈给最高级文官，由其总体判断书中的修改内容是否恰当，若有误，高级文官可否定中级文官的决定，而采用初级文官的修改。总之，一本书要经过三审三校后方可呈乾隆终审。乾隆同意后，这本书才算最终确定。《四库全书》编纂所依据的底本大多是珍贵善本。譬如，宋元刻本或旧抄本。还有不少是已失传很久的书籍，在修书时被重新发现，也有的是从古书中辑录出来的佚书。全书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传世的中华经典文献，是对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最全面的系统总结。”刘冰说。

叁 三次入出宫的悲壮历程

19世纪后，《四库全书》随着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也是命运多舛。1853年，“南三阁”中的文宗阁和文汇阁连同藏本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被毁。1860年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，文源阁及其藏本一并化为灰烬。1861年，太平军进攻杭州，文澜阁藏本散失，仅剩一半。藏在承德文津阁的《四库全书》于1915年运抵北平，现藏于国家图书馆；北京故宫文溯阁藏本于1933年运到上海，后又迁徙重庆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沈阳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则经历了三次入出宫的颠沛过程。乾隆四十八年，《四库全书》运入盛京宫殿文溯阁，这是第一次入宫。1914年，北洋政府下令调运盛京故宫文物进北京陈列，《四库全书》运往北京。1925年，奉天教育界人士筹建奉天图书馆，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回到沈阳，这是第二次入宫。1950年10月，朝鲜战争爆发，有关部门决定将《四库全书》连同宋元珍善本图书运出沈阳。1954年1月，《四库全书》运回沈阳故宫文溯阁内，这是第三次入宫。《四库全书》最后一次出宫是在1966年。考虑到时局，中央决定将《四库全书》调由甘肃省保存。在《四库全书》运出之前，辽宁省图书馆的职工花费了1个月时间对《四库全书》进行了清点和保养。“工作人员是逐函、逐册、逐页地进行清理，书籍上面的水迹、斑点、破损等情况都详细记录在了清点卡片上，凡发现有破损处均做了修补。还整理出了一个完整的《文溯阁四库全书检查纪要》，一并交给了甘肃省图书馆。”刘冰补充道。那一天是1966年10月7日，清点好的《四库全书》在沈阳铁路局的精心安排和高度保密状态下开始启运，于10月底到达甘肃兰州。从此，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再也没有回到辽宁，只留下空荡荡的文溯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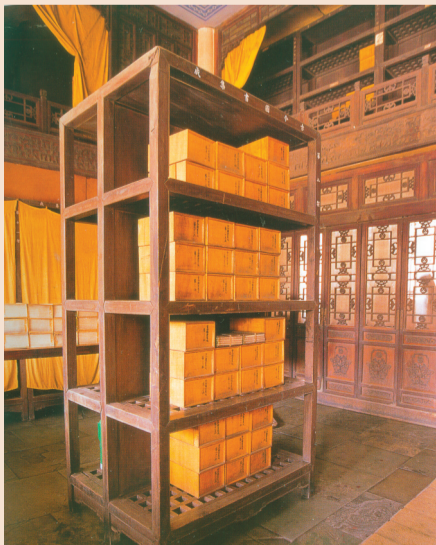
盛夏的沈阳，天气一反常态，一场雨接着一场雨，仿佛空气中都长出了青苔。伫立在沈阳故宫西路文溯阁的牌匾下，说着《四库全书》的故事，沈阳故宫博物院副馆长李理的表情略显沉重。

当我们走进文溯阁，看着一楼正厅摆放的红雕花大书案和书案上的皇家文房用具，我的眼前不禁浮现出乾隆皇帝端坐捧读《四库全书》的身影。还有那一众《四库全书》的编者们夜以继日地劳作校改，致使总纂官陆锡熊、总校官陆费瑔不堪此折磨或病死或郁郁而终的结局。这其中的故事既有孜孜以求的艰辛，又有被处以几万两白银罚款的酸楚，更有往返北京与盛京间的悲情苦旅。这一切，都是因为文溯阁这个读书处，乾隆的藏书楼。

将思绪收回。我们通过狭窄的木制楼梯，上到二楼，只见当年贮存《四库全书》的金丝楠木书架空落着，乌黑中透着暗红，楼内依然飘着楠木的香味。阁中寂静，寂静得让人感觉不到人世的喧闹。如果不是楠木书架上雕刻着“集部第××架”的字样，我们似乎遗忘了历史，遗忘了文溯阁240年的沧桑。书架、窗棂、门格，这些都是楠木的，都与那部《四库全书》有过无间的亲密——高档的木料配得上高品质的书籍。

“文溯阁”匾出自乾隆的手笔。为什么称“文溯”？李理说：“乾隆是个饱读诗书之人，这点通过他给‘七阁’所起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的文化匠心。”当年，抄好的《四库全书》分藏于“七阁”之中。“七阁”之名大多带有水字旁，取水立意，意在仿效宁波范氏天一阁借水克火，以求阅书永存。关于“文溯阁”之名的含义，乾隆第四次东巡驻蹕盛京宫殿时曾写下《文溯阁记》。其中谈到“内廷四阁”(即“北四阁”)的立意，说“四阁之名，皆冠以文，而若溯、若源、若津、若湖，皆从水以立意。”“水各有源，同归于渊，溯为源尾，源为渊头；由溯觅源，其经为津，其行为溯。”所以乾隆又写道：“恰于盛京而名此名，更有合周诗所谓‘溯洄求木’之义，而予不忘祖宗创业之艰，示子孙守文之模，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”可见乾隆在“文溯阁”的命名上不但有存书之意，更是期望后世子孙能读书明理，让祖先创下的基业永久延续，与《盛京赋》主旨一脉，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。

沧海桑田，当历史烟云散尽，世事飘若尘埃的时候，我觉得，没有什么比卷帙浩繁的典籍更能让人读懂文明演进的历程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人们才将《四库全书》视为同万里长城、大运河相并列的中国古代三大工程。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因为曾经收藏《四库全书》，文溯阁一直被人们仰望。这是一份追慕，一份伤感，还有一份企盼。我想，无论谁怀着什么样的情感，应该都是《四库全书》这部典籍的无限魅力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感召吧。



文溯阁内曾摆放《四库全书》的楠木书架。本报记者 吴限 摄



更多精彩内容 扫码观看